

宝庆讲寺丛书

中国佛教学者文集

朗宇法师 清修法师 主编

# 中西丝路文化史

李志夫 编著



宗教文化出版社

宝庆讲寺丛书

中国佛教学者文集

主编 朗宇法师 清修法师

副主编 圣凯 道坚 黄夏年



# 中西丝路文化史

李志夫 编著

宗教文化出版社

# 中西丝路文化史

李志夫 编著

宗教文化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中西丝路文化史/李志夫编著. — 北京:宗教文化出版社,2010.9

ISBN 978-7-80254-305-8

I. ①中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丝绸之路-文化史 IV. ①K20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179968 号

**中西丝路文化史**

(宝庆讲寺丛书·中国佛教学者文集/朗宇法师、清修法师主编)

李志夫 编著

---

出版发行: 宗教文化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(100009)

电 话: 64095215(发行部) 64095210(编辑部)

策划组稿: 黄夏年

责任编辑: 张伟达

版式设计: 陶 静

印 刷: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

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

版本记录: 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6 印张 435 千字

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54-305-8

定 价: 45.00 元

---

## 总 序

从佛法本身来说,教、理、行、证的修学次第,已经为佛弟子指明了修学的道路。但是,佛弟子因为自己的资质、喜好的不同,往往有所偏向,于是形成不同类型的佛法,有重义理、重实践等区别。但是,作为佛弟子来说,义理的探讨是为了将佛陀所要开示的真实事理,充分、完整地表达出来,如“阿毗达摩”虽然着重于论证“法”的自性、定义、关系等,但是其本意仍然在于“谛理的现观”,最终归于修证。那么,重修证的佛教,主要是从利益众生的角度,重视佛法的适应性、实效性,所以对事相的分别比较少,如初期大乘经典以“般若”、“三昧”、“解脱门”、“陀罗尼”、“菩提心”等作为中心,来表达从发趣、修行到证入的历程。虽然存在着种种不同的侧重,但都是佛法的根本,都是以义理知识与实践经验相结合为中心。中国佛教其实已经非常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,如天台智者大师的教观并重,这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。《高僧传》将





古代僧人分为十科,其中翻译、解义、读诵便属于义解门;而习禅、明律、感通、遗身、护法、兴福,都是属于实践门;最后一科“杂科”则是指出家人的外学修养,旁及世间经书、治世语言、礼乐文章等,无不兼通。

但是,传统意义的佛教义解,主要是注疏经、律、论,在“述而不作”中表达自己的理解与观点,当然也有一些专门性的著作。而且,这些佛教义解僧,都是从自己的信仰与经验出发,通过注疏、论著,来达到实践与弘法的目的。南北朝佛教的兴盛、隋唐佛教的辉煌,都与义解的繁荣是分不开的。而禅宗的发展则为中国佛教注入新的生命,重视主体的体认、自己身心的解脱;净土法门的流行,激发了信仰佛教的感情,为佛教走入社会提供了方便。但是,我们也应该看到,随着禅、净的流行,在这种“简单”、“不立文字”的潮流下,中国佛教徒逐渐失去探讨高深佛理、考察繁琐戒律的兴趣。于是,中国佛教重视义理研究的优良传统便丧失殆尽。

另一方面,佛学研究在佛教界之外却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。近代意义上的佛学研究,应该是开始于欧洲殖民主义者侵入亚洲地区,殖民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殖民统治,必须要深入研究亚洲的宗教及其文化。于是,通过接触梵文、巴利文等东方语言,开始了解佛教的理论,消化佛教的教义。在“理性主义”、“科学

主义”思想的影响下,这些学者注重现代佛学研究的客观性、纯学术性,形成了佛学研究的现代传统,于是佛教便成为一种学问——佛学。19世纪后期,日本佛教界开始运用西方的学术研究方法,从而推动了日本佛学研究的兴盛与发达。随着“西学东渐”、日本佛教对中国佛教的影响增强,中国开始有了近代意义上的佛学研究,这在当时中国佛教界引起很大的反响与回应,如《大乘起信论》、《楞严经》的辨伪,“大乘佛教非佛说”的讨论,“佛教非宗教非哲学”之辩等。同时,佛教界受时代流行的学术方法的影响,尤其是以太虚大师为首的“人生佛教”运动,佛教理性主义思想的高扬都直接推动了佛教界从事佛学研究,其中以印顺法师的成就最大。但是,相对来说,学术界则在佛学研究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,像吕澂、陈垣、汤用彤等,皆为一代学术大师。

改革开放后,中国佛教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,经过二十年的努力,佛教界基本上完成了修复寺院、重塑佛像的工作,寺院呈现出游人如织、香火旺盛的现象。于是,培养人才、弘法、学术研究等工作提到首要位置。然而,人能弘道,非道弘人,各方面人才的紧缺无形中遏制中国佛教事业的发展。而人才的成长与培养,这又与佛教界的观念与重视程度是成正比的。

近代佛教学术研究的发展,由于受到欧美治学风气的影响,文献学、考据学、思想史、语言学、社会学、人类学等方法被大量地使用,对佛教进行理性地分析,定性定量,促使人们对佛教认识更加深入。学术研究作为一种工具,用来剖析佛教的历史与思想等等领域,扩大了佛教的知识面,更凸显了佛教的悠久历史和文化积淀。学术研究利用各种先进的研究方法,通过对各种文献的比较研究,不断挖掘利用新出土的资料,显示其优胜之处。通过学术研究,使佛教的思想体系与历史发展脉络更加清楚,提高了人们对佛法的正确认识。从事学术研究的社会学者本身就是社会的精英,对社会了解非常透彻,其思想观点往往能够补充僧界的不足;同时,他们作为佛教界与社会沟通的桥梁,圆融转化佛教的思想,向社会表达佛教的看法,这些都是有益于社会与众生的活动。

因此,佛教学术研究的根本意义,不仅是了解存在于一定时空中的佛教发展形态,而且更是从现存的文献、文物中,去伪存真,去粗取精,探索其前后延续,彼此关联的因果性;从而更清楚地认识到佛法的本质,及其因时、因地的适应。以了解过去,承受根本的佛法特质,作为我们信行的基础,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中国佛教协会第七届代表大会便提出要契理契机地弘扬“人间佛教”思想,其中一项重要内容



便是“以文化阐扬佛法，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契理契机地以文化阐扬佛法是实现佛教中国化、本土化、现代化的权巧方便。”现代中国佛教界，应该认真地认识学者们的新观点，吸收其中的有用之处，通过转化与变通，仍然能够落实到佛法的信仰与实践，佛教才具有更大的潜力。

宁波宝庆寺始建于北宋端拱二年(989)，至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。嘉定十五年(1222)宋宁宗赐名“宝庆讲寺”。寺里历代住持及僧众均有重视义理、尊重学术、礼待学人的优良传统，一直讲法不辍。曾在中国历史上流传最广，现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世界性启蒙教材《三字经》的作者王应麟曾为宝庆寺撰写了《宝庆讲寺记》。大儒黄震为寺里撰写了《宝庆寺观音殿记》。此二文的碑刻至今仍然保存完好，高高地耸立在寺里。现在宝庆全寺僧众十分重视自身素质的提高，在日常事务、早晚功课、坐禅念佛等之外，勤于读书，研究经论。我本人自从出家以来，参访名山大寺，受到多位高僧大德善知识的指点，喜欢研读经论及现代学者的研究著作。因此无论到哪里，我都会带上一些书，也经常会到各地的书店去逛逛，看到佛教书籍经过十多年的出版，蔚为大观，感到欣慰。但是，对于社会的需求和佛教文化的发展，目前出版的书籍远远无法满足人们对佛法的需求，而且现

## 序

“西域”是中国古代新疆以及中亚地区的统称。这块地方面积广大，自古就是东西方商贸要道，更是宗教文化交流通道，我国古代“丝绸之路”。从汉代起，中国内地就与西域有了密切交通往来，当时西域有三十六国，水草丰茂，牛羊遍地，骏马欢腾，商旅不绝。从古代的《山海经》到后来的《汉书》等诸多古籍都记载了西域的山川地理与风土人情，至今读起来仍然感人，令我们向往。

汉代张骞出使西域，驱赶了匈奴，保卫了边疆的稳定。苏武牧羊十八年，心向汉地矢志不渝，催人泪下。“羌笛何须怨杨柳，春风不度玉门关。”作为古代中外商贸文化交流的孔道——西域，它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底蕴却是如此深厚。古代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国家，中外文化的交流，主要就是依靠西域这条古道完成的。在这条古道上，先后走过来佛教、摩尼教、景教、伊斯兰教等世界各大宗教，特别是佛教早在 2000

年前就沿着西域走入中国,不久就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当然在这一地区先后出现过多个民族,随着日月的流失,这些民族与汉民族交往融和,促进了民族团结,乃至最后融入了汉族大家庭。

丝绸之路存在千余年时间,之后由于种种原因,渐渐不再发挥作用,然而这一千年是中国历史文化建设最有丰采的时代,曾经对中国文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。时值今日,这一地区仍然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存,已经成为世界学术界瞩目研究对象。近代以来,西域文化一直引起学者的眼球,从最早瑞典斯坦因和后来的俄、英、日、法等国的学者,都曾经对西域的文化遗存做过破坏性的掠夺,他们的学术成果就是建立在这些遗存文物上的。20 世纪的相当一段时间里,西域学在国外,这种局面激励我们要去迎头赶上。近几十年来,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,经我国学者的努力,特别是新疆学者的重视,我国在西域学方面已经取得不少成果,西域考古新发现,使我国学者研究在这方面发挥了优势,尤其是在资料的整理与新成果的展示方面尤其突出,为繁荣我国的西域学研究作出了积极贡献。

近年来,台湾学术界人士也在不断关心西域学研究。台湾法鼓山中华佛教研究所前所长李志夫教授牵头,组成研究西域文化团队,多次前往新疆等地考

察,搜集材料。最近志夫教授将他编撰的西域学方面的著作出版,可喜可贺。

志夫教授的著作,史料丰富,尤其是利用了佛教的资料。该书所撰写历史时限长久,从史前到清代皆有涉及。其内容又涵括了民族与宗教,重点是在佛教与伊斯兰教,对曾经流传在西域的各民族历史作了梳理,对佛教的高僧资料作了整理与介绍,特别是着意于对古希腊、古罗马、古波斯与印度关系的溯源,从此可以看出西域宗教的源流变化,也较好地说明了中外历史、宗教与文化交流的盛况。本书的出版,有助于我们对西域历史文化整体的认识与把握,对我国的西域学研究也必将有一个推进。

日动月移,星斗升降,西域是衰落了,昔日沃野千里的草地成为戈壁沙漠,当年繁华喧嚣的都市只剩下残垣断壁,然而历史不能忘怀的,大漠深处始终充满着昔日的雄风,壁画断瓦始终绽放出生命的活力。今天当我们踏上这块曾经充满记忆的荒漠,仍然能够感受到商队的驼铃声不绝于耳,我们伫思在布满壁画的洞窟,仿佛正在与先贤们作心的交流。抚古惜已今,我们不能不有所感慨,发思古之悠情,树今人之立论矣!

志夫教授是我多年朋友,也是同行。他曾经在印度学研究方面出版过专著。嘱我写序。恭敬不如从

◎  
序

命，只好提笔应试，权充续貂。

黄心川

2010年2月13日(除夕)于北京潘家园寓所



## 自序

2003年,中华佛学研究所在创办人圣严法师亲自领导下,与大陆有一连串文化交流活动:首先与中国佛教协会举办“两岸佛教教育会议”;随即赴青岛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、青岛风景管理处共同举办“纪念法显大师返国登陆崂山1590年学术会议”;再访山东大学,与其宗教科学与社会问题研究所签订交流协议书。

最具有历史意义的,当然是纪念法显大师的会议。在这会议的开幕式上,我的开幕词是:“我们还能作法显大师作些什么?”在学术会议中,我也另外发表了一篇短文:其主旨在呼吁两岸学者,能合作为法显大师作些什么的计划大纲。

2004年,承武汉大学麻天民教授引介,塔里木大学与本所订立交流关系。于是,我们有了人和、地利的条件,《丝路中印文化交流研究计划》逐渐形成。我们把原计划扩大,将玄奘、义净两位大师在西行之



行脚，亦并入作为主轴；复将历史上三大师行脚沿线之重大事件、人物，由点成线、由线成面、由面成体，构成一时空地图。有了这样的架构，以后随时可以增加、修正数据。它不仅是“网络上丝路文化交流之总库”；也是“网络上丝路文化交流之通鉴”。免费上网提供学者参考利用。

本研究计划不在创新、发明，旨在集其大成，以免有关学者工作重迭，浪费研究人才、时间与经费。而本书大部分就是将各种史料、数据，编撰、节录而成。由于各文献中，在同一人、同一地、同一国，使用之名词多不一致，我们在书后列有“对照表”；对西域各种族之发源，各家亦有不同的见解，我们无力一一考证、比较，只是照录，各存其说。比如人类考古学家，即使对同一地点所挖掘出之同一古物，也有不同的认定。

所以本书根据中国历史文献，凡源自北方蒙古经河西走廊西迁者，都视为“中国北方草原部族”，都应是古代炎、黄之后，即使有些历史学家不承认是正史，可是在华夏大地上民族文化之发展也是必经采撷、狩猎、生食、熟食、农业、交换、商业之阶段，有部族争战、并吞、分裂之史事，我们就以“炎黄子孙”名之，这应是最务实的观点。

※

我将前面所提两篇短文，已列入本书的“附录”

中,如果读者看了这两篇短文之后,就会了解笔者何以从法显大师所得之感动,有甚于得自玄奘大师的感动。虽然法显并非中原人士经西域到天竺的第一人,但绝对是立志从事西行天竺求法的第一位法师。

由于想为法显大师作些什么,所以这几年来,我对西域历史、文化付出了极大的关心:发现中国北方的草原民族,都是从事游牧为主的炎、黄子孙,他们在西域开疆辟土,做中西(印)文化交流的中流砥柱,又使我产生另一种悸动。所以本书之核心思想,就是在彰显他们在这方面的影响及贡献。

中国北方草原部族,除了月氏、匈奴在西域殖民之后,与中原政权殊少往来;但在佛教的传承上是有贡献的;其他在西域一度建立政权的,如乌孙、突厥、西辽、回纥、蒙古,在他们对外时,甚至也以中国人自居。他们虽与中原政权时战、时和,若即、若离;但大都与中原政权具有依附关系。尤其当他们失败之余,都愿回归中原政权,实有落叶归根之思;中原政权亦视其为游子远游还乡,对其慰藉、优渥有加。因此,中原政权历代大都视西域为中原之属地,才能有清末新疆之设治。

本研究计划将另行上网;出书计划中本所负责历史部分;塔里木大学预计编著《中亚地质、地理、地貌》一书;印度德里大学沙洛教授负责计划之部分,将

◎  
自  
序

编著《三大师印度行脚地区今昔之变迁》一书,各自分别出版单行本。这三本书可算是《丝路中印文化交流研究计划》之副产品。

本书是本研究计划资料之汇编节录而成,对原书作者深致谢意。如节录有失原作之完整性,势所难免,亦深致歉意。

本研究计划自2004年,阳明山光泉寺方丈全度法师为其先翁雨淋公之遗爱,捐助新台币200万元;2007年“国科会”补助近百万;2008年获台北龙山寺副董事长黄书玮博士与董事长黄钦山老居士补助100万,特此申谢。我们力求利用有限的经费,能把《丝路中印文化交流研究计划》之时空架构完成。承蒙补助之研究费,全部用在本计划工作同仁之待遇上,即使“国科会”分拨本人之主持费,都支应在工读生的工读费上。

本人虽痴长八秩有二,仍不会计算机,只能用最传统办法亲自检校文本,再节录抄译;或以铅笔在书上刻划摘要,交工读生、义工人士打印,所以本书部分未敢动支以上补助费分文。因此,我要深深地感谢詹丽春居士,两年来一直义务为本计划打印资料、校正手稿;还有张薛兴会计师能在余暇为本书打印、校正手稿。他们两位之细心、用心,使我感愧交加。

与我共事5年的李丽华秘书,她是一位全职、全